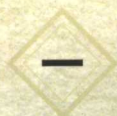


曹道衡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

精品



曹道衡 著

中华书局

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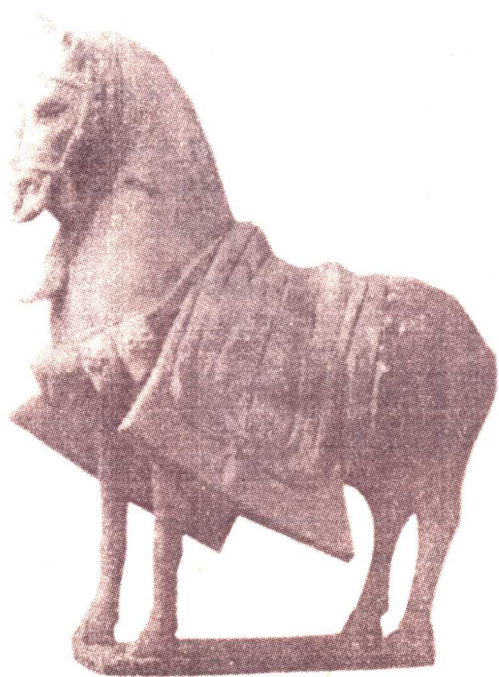
精品



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

曹道衡 / 主编

精品
(一)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精品/曹道衡主编.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11

ISBN 7-5387-0974-6

I. 汉… II. 曹… III. ①赋-作品集-中国-古代
②骈文-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①I222.4②I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1370 号

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精品(一)

选题策划: 张明 郝勇

主 编: 曹道衡

责任编辑: 张秀枫

装帧设计: 龙振海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霸州市福利胶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8.125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 7 - 5387 - 0974 - 6/I · 931

定 价: (全套 30 册) 680.00 元

编委会成员

余冠英：著名文学史专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国际笔会会员

主编：《诗经与楚辞精品》

曹道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编：《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精品》

霍松林：著名文艺理论家、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诗人、书法家、教育家、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主编：《唐诗精品》

吴熊和：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院长

主编：《宋词精品》

王季思：中国古典戏曲协会会长、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编：《元曲精品》

邓绍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编：《明清小说精品》

郭预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主编：《中国历代散文精品》

张少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

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品》

目 录

(一)

导 论 曹道衡 (1)

辞 赋

贾 谊

吊屈原赋 (24)

鹏鸟赋 (27)

枚 乘

七 发 (31)

淮南小山

招隐士 (47)

司马相如

子虚赋 (50)

上林赋 (58)

长门赋并序 (71)

东方朔

答客难 (76)

司马迁

悲士不遇赋 (82)

王 褒

洞箫赋 (85)

扬 雄

逐贫赋 (91)

解 嘲 (95)

班 彪

北征赋 (104)

班 固

西都赋并《两都赋》序 (109)

东都赋 (125)

幽通赋 (137)

傅 毅

舞 赋 (149)

张 衡

归田赋 (156)

思玄赋 (159)

马 融

长笛赋 (180)

蔡 邕

述行赋并序 (191)

王延寿

鲁灵光殿赋并序 (200)

赵 壹	
刺世疾邪赋·····	(208)
祢 衡	
鹦鹉赋·····	(213)
王 粲	
登楼赋·····	(218)
曹 植	
洛神赋并序·····	(222)
嵇 康	
琴赋并序·····	(231)
向 秀	
思旧赋并序·····	(242)
成公绥	
啸 赋·····	(246)

导 论

曹道衡

把辞赋和骈文这两种不同的文体合编为一部选本，这在历代的总集中，也许很少其例。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总集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纂的《文选》。在这部书中，不光有赋，有骈文，而且还有诗，因为它是梁初以前各种文学形式的总结性选本，理应包括当时人心目中认为属于文学范畴的一切作品，因此其性质和我们现在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部选本不同。后来出现的选本很多，但大体上有几种不同的类型。像《文苑英华》、《唐文粹》等，基本上是沿袭《文选》以来的传统，也属诗文兼采。不过前者乃继《文选》而作，亦有通代的性质；后者则为有唐一代的文学总集，以后的《宋文鑑》、《元文类》《明文衡》等，都属于这一类。但多数的选本则主要限于一种文体，如诗、文、辞赋以及后来的词和曲等。至于把辞赋归入“文”的一类，虽属古已有之，但值得注意的是把辞赋和散体合选，确有先例，如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就是这样。但此书体现的是“桐城派”的文学思想，对魏晋六朝作品基本上不收，其辞赋也主要选录汉赋，对六朝人的作品，仅取了一篇鲍照《芜城赋》。这已经可以说是特例了。至于和姚鼐同时稍后的李兆洛所编《骈体文钞》，多少有点和姚鼐唱对台戏的用意，但这部书却并没有选录辞赋。如果说前人的选本中有骈文和辞赋合抄的成例，大约就是清许

琰的《六朝文絮》中，选了几篇小赋。但此书所收，大抵限于短文，所以连庾信《哀江南赋》这样的名篇，也没有入选。这是由于编者本意，是在六朝人文章中选取其简洁之作，故取名“文絮”，其不取长篇当然也可以理解。正由于上述的种种情况，当时代文艺出版社的先生们向我提议编选这部选本之初，我也曾经颇为迟疑，觉得也许会招致“不伦不类”之讥。现在想来，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因为现在我们来作古典文学的选注工作，其出发点和古代人编选本是完全不同的。古人的选录作品，大抵是要从中选取作文的范本，以此供人们应科举或出入官场之用。所以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提到了宋人有“文选烂，秀才半”的俗语；而姚鼐的编《古文辞类纂》，尤其注重像“奏议”、“书说”、“碑志”等应用文字。但对我们今天来说，根本就没有这种需要。今天的读者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无非是为了理解我国古代瑰丽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也可以给文艺工作者提供某些借鉴。从这个目的出发，把辞赋和骈文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的代表作选录出来，合为一册，的确是无所不可的。问题只要泾渭分明，不致使人对文体的概念产生混乱就可以了。

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考虑，把辞赋和骈文合为一册，也确有其合理性。因为在我们这本书里，选的都是汉魏六朝的作品，从时代上说既然相同，而且有些骈文和辞赋，还出于同一作者之手，例如：在本书中所选录的司马相如、班固、蔡邕、曹植、嵇康、阮籍、潘岳、陆机、谢惠连、颜延之、鲍照、江淹和庾信都是这样。这是因为不少作家本来就兼擅众体，所以不能有所偏废。如果更深一层从文学体裁的发展来讲，“文”和“赋”二者的骈俪化可以说是同步的，甚至还可以说比较严格意义上的骈文，更是深受辞赋的影响。因为“骈俪化”的倾向本来是由于汉语，特别是古代汉语中基本上都是以单音节词为主，所以人们在

说话或作文时，都不免要使用字义两两相对的句子来加强其美感，这样就逐渐使文章中的对偶句日益增加。早在先秦时代的一些典籍中，不论是有韵之文或无韵之文，都有这种情况。所以骈文和散文分家究竟始于何代？这个问题历来就没有人能加以说清，事实上大约也无法真正说清。清代的“桐城派”散文家姚鼐是竭力提倡散文，排斥骈文的，但他在《古文辞类纂》中所选录的许多秦汉人的文章，被奉为“古文辞”的典范；但李兆洛的《骈体文钞》也同样可以採录这些文字，指为骈体文的初祖。唐代的散文大师韩愈，号称“文起八代之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语），也是反对骈文的健将，他自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然而他在《进学解》中所推崇备至的“子云相如”（扬雄和司马相如）的作品中，骈俪之句亦复不少。如：

“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

“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宇”。

——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

“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

——扬雄《解嘲》

这都是不折不扣的骈句。这种情况，连韩愈自己，也不能避免。他在《进学解》中说什么“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这些句子的对仗都很工整，可见“骈”和“散”的概念，本来只有一定的相对意义，绝对的“骈”和绝对的“散”的文章，即使不能说决没有，也可说非常稀少。我们今天更用不着再存那种门户之见，去加以强分优劣。

文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不论对“文”还是“赋”来说，

“骈”、“散”都本是同源的。清人孙梅在《四六丛话》卷三中曾经说：“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骈体之先声乎！”这段话大凡论骈体文的人都喜加称引，可见这种看法已为广大研究者所采用。今人姜书阁先生在《骈文史论》中说：“秦、汉以后，骈文渐兴，而汉赋实启其端，故论骈文不能舍赋。自来言骈文之起源，皆谓始于东汉末季，又多举蔡邕、王粲、曹植等人的作品，而这些人又无一不是赋家。六朝骈文大盛，实亦仍以这时的骈赋为重要的代表”（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本第75页）。为了说明这个观点，姜先生在这部著作中，还专门有《汉赋骈始》一章，加以详论。姜先生这些意见，笔者认为都是很有道理的。笔者过去在《汉魏六朝辞赋》一书的“结束语”中，也曾谈过类似的看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第198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把辞赋和骈文分作两个部分而合为一册出版，是完全可以的。

二

本书所选的辞赋上起汉代的贾谊，下迄周、隋之际的庾信，共选了近四十位作家之作，基本上与汉魏六朝相终始。在这里所录汉赋约二十余篇，魏晋南北朝赋约三十余篇。从选录的数量看来，魏晋南北朝赋的篇数似乎超过了汉赋。这和历来论者的看法似乎不太一样。这是因为汉赋文字过于艰涩，很难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本书所选的汉赋，自然是大大地不够的。以扬雄为例，他的《河东》、《甘泉》、《羽猎》诸赋都没有入选，而仅取了《解嘲》和《逐贫赋》。这就很难看出他和司马相如“同工异曲”的情况。关于这一点，笔者曾反复地作过思考，看这样做是否妥当。最后终于决定割爱的原因是像扬雄这些赋，手法上大体效法司马相如，尽管在一些技巧和风格上仍略有不同，但这种细致的区别，对初学者来说，往往很难觉察出

来。尤其是这些奇字特多的辞赋，读者往往望而却步，更何论去探讨两人手法上的异同？关于东汉京都大赋只取班固《两都赋》而未取张衡《二京赋》，也是出于同一原因。其实在笔者本人来说，对于班、张二人的赋，似乎更喜欢《二京赋》。但由于《二京赋》更为繁富，难读的片段更多，文字也 longer，只能捨张而取班了。关于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赋的选录方面也有类似的例子。例如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在历代都很有名，但由于篇幅过长而且艰涩难读的程度也不亚于汉赋，如果全部收录，则不但会显得太多，而且也会使读者的兴趣减退。好在汉晋两代写京都的大赋，大抵都是前面夸饰侈丽之文写得相当精彩，而后面“曲终奏雅”，阐述作者正面观点的篇章往往显得空洞无力。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已开其端，班固《两都赋》显得尤为突出，张衡《二京赋》较班固稍好；而左思《三都赋》的精彩部分则几乎集中于《蜀都》、《吴都》二赋，其《魏都赋》实在已成强弩之末，可称道处甚少。如果仅选蜀、吴，仍非全帙。好在已有瞿蜕园、毕万忱二先生的书在前，我们不妨取法，所以只选了《蜀都赋》。魏晋以后的大赋中仍有一些佳作，像木华的《海赋》就是一例。但这样的作品并不多，郭璞的《江赋》虽也有名，其艺术成就却远不如《海赋》，而且其怪僻的奇字之多，较之汉赋尤甚。笔者对这篇作品考虑再三，最后觉得还是不要入选。此外，同类的题材还有南齐张融的《海赋》。此赋在艺术上虽赶不上木华，却胜于郭璞《江赋》。只是这题材已有木华在前，而且此赋夺误甚多，收入《南齐书》本传时可能已非全文，所以没有选录。东晋以后的不少大赋，现在大抵已散佚，而且有些在当时已遭有识之士的讥评，概可从略。至于谢灵运的《山居赋》和沈约的《郊居赋》，都是刘勰说的“志深轩冕，而讯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文心雕龙·情采》）之作，艺术上亦不见精采。再加上谢赋因为艰涩，自己作注；沈赋甚至在当时就怕人读

错。所以萧统编《文选》把这两人的赋作一概弃而不录，实在是颇具卓识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谢灵运、沈约在文坛上的地位极高，如果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很难做到这样。所以本书在选录辞赋时，比较注意选录《文选》中已经收录之作。因为《文选》在我国古代的总集中享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经过一千多年的考验，影响极大。对于本书的读者来说，有不少应该是大学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在参加硕士生或博士生的考试时，对其中的各篇应该有所了解，所以对不少作家的作品，尽量选用《文选》中已有之作，而不另选其他作品。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在《文选》所收的作品以外，没有佳作，但限于篇幅，只能作这样处理。

在本书中所选的辞赋，还有几篇是其他选本所很少选录的，如颜延之的《赭白马赋》即是。这也是笔者几经考虑过的。《赭白马赋》的内容颇有些歌功颂德的庙堂气息，内容不见得很好。但在文体上很见特色，其对仗之工整，在骈赋中颇少其例，姜书阁先生在《骈文史论》中曾特别加以论述。再说赋中写骏马之状，颇多佳句，其“旦刷幽燕，昼秣荆越”二句，更对李白、杜甫的诗有影响，值得重视。至于北朝辞赋，在艺术上也许比同时南方文人之作有所逊色，但为了使读者对北人赋作有个了解，也应择其较好之作，略取一二篇以见一般，以免使人觉得当时北方文学只是一篇空白。但其中像卢元明的《剧鼠赋》，带有俗赋的气息，这可以上继曹植《鹞雀赋》，下开敦煌俗赋，对理解俗赋的发展线索有一定帮助。何况此赋也确有其长处，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已有详论这里不拟赘述。

关于骈文的选录，笔者同样有过不少思考。例如骈句的产生当然很早。姜书阁先生的《骈文史论》一直追溯到了《尚书》。但他所举的例子，多半出于东晋梅賾所献的伪《古文尚书》，恐难置信。然而先秦典籍中所见的骈句确实很多。至于本书探录的范围应限于汉魏六朝，所以这些先秦文章只能从略。至于西汉

人的文章，究竟何者可以算骈文，本来争议很多。笔者考虑到历来人的见解，仍以东汉末年以后人之作为主。不过为了说明骈文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所以选录了邹阳、司马相如和班固的四篇骈句较多的文章，以见其大概。选录骈文时的困难和选赋不大一样。选赋之难在于怎样在使读者对各种赋的体裁特点有个大致了解的前提下，避免那些奇字太多，容易使读者望而生畏之作。骈文在这方面的问题较少，即使有些费解处，也只是由于用典较多，但这完全可以用注释来解决。因为一个典故，出现在某篇文章中，通过注释来理解以后，再次出现时往往就了然于心；不像汉赋中一大堆奇字，在这里看到过，到那里往往又已忘却。然而赋虽然比较艰涩，却没有入否认它是文学作品；骈文就不同了，在现代人的“文学”概念里，一般都不把应用文看作文学的范畴。古人的看法则与此不同，所以不论《文选》、《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等书所选录的散体或骈体的文章，有很大一部分是应用文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完全按照今人的文学概念去要求古代人的文章，大约是行不通的。笔者参考过一些近年来出版的骈文和散文的选本，其中仍有不少是应用文。以骈文为例，像著名的丘迟《与陈伯之书》、吴均《与朱元思书》其实都是应用文；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大约是朋友间的调侃之作，未必真是愤怒声讨，但它的文体总属于“檄移”一类，本属应用文的一种。因此这个矛盾看起来是解决了，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南北朝的骈文家中，有些本是以应用文著名的。像梁代的任昉，当时人有“任笔沈（约）诗”或“任笔谢（朓）”之说，对他的评价很高。《文选》中所收任昉之作，也以应用文为多。但在近年以来出版的一些选本和文学史中，几乎都很少提到任昉，对他的文章更无人选录。这恐怕也有失公允。笔者在《任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见《齐鲁学刊》1993年第四期）一文中曾详谈过这个问题。因此这次选录了他那篇著名的《奏弹曹景宗》，

此文不但义正词严，笔挟风霜；而且把蔡道恭的英勇奋战与曹景宗的畏怯不前作了鲜明的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读了此文，也许可以帮助读者对任昉在当时所以能享有盛名的原因有所理解。此外篇名作，这种简短而华美的短语，在古代文章中别具一格，历来作者虽多，但都不及陆机的精妙，所以选此一篇，使人对这一文体有所了解。在骈文部分中，最使笔者犹豫的也许是关于沈约的文章。因为在齐梁时代，沈约曾被人们视为“一代文宗”，他的诗文在当时都颇享有盛名。但在他现存的骈文中究竟以选录哪篇文章为宜？他最有名的文章应该是《宋书·谢灵运传论》，但那主要是一篇文章批评论文，应由文论家来选注。《文选》中所录沈约骈文像《奏弹王源》，充满了门阀观念的偏见；《齐安陆昭王碑》其实是为一个并无作为的萧缅树碑立传，真正目的在讨好齐明帝萧鸾，都不宜选录。最后的考虑还是采取了他那篇《陈情书与徐勉》。因为这篇文章倒是反映了沈约晚年的真实心情，其本意是想升官，而口气却又像在辞官，而字里行间热衷名位的心情又欲盖弥彰。这种文字就比《郊居赋》更易想见其为人。再加上“沈腰潘鬓”的典故，早已为历来文人所习用。这样才选录了这篇文章，以见其骈文的一斑。

总之，本书的意图是既要选录思想和艺术都较好，又要避免过于艰涩难读，还得多少反映出辞赋和骈文这两种文体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三个方面有时确实颇难同时照顾到，因此在考虑选目时，笔者的确也曾费过一番苦心。然而，这毕竟不是一件易事，再加上自己的水平有限，颇感力不从心。现在只能把已经考虑到的，编成此册，以供大家指正。其中缺点一定不少，只能有待再版时加以改正。

另外，本文在选录作品时，对有些篇章的处理，和别的选本略有出入，这是因为吸收了近代以来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一般都作为两篇作品，但

据近人高步瀛《文选李经义疏》考证，司马相如原来的《子虚赋》已经散佚，现在见于《汉书》《文选》等书的，实际上是献给汉武帝看的“《天子游猎赋》”；现代不少研究者大抵同意此说，但称之为“《子虚上林赋》”，我觉得为了使读者易于了解起见，还是合称《子虚上林赋》较好。又如木华的《海赋》，据屈守元先生转录的日本藏古钞无注本文选，多出十六个字。这是通行本《文选》误夺的文字，应予补入。但同样地，《世说新语注》中所载左思《蜀都赋》中也有佚文。然而这几句是否原来本有，还是后来已删，现在还弄不清楚，所以只能仍通行本之旧。这些问题也应该在这里顺便交代一下。

三

关于“赋”这种文体，究竟起于何时？为什么称之为“赋”？前一个问题大家的意见似乎比较一致，都认为始于战国。至于第二个问题就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它是种只供诵读而不加歌唱的文体，其根据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不歌而诵谓之赋”；另一种认为“赋”是诗的一种，其根据是班固《两都赋序》中称：“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后来的人就把此语和《周礼·春官·大师》中的“六诗”（“风”、“赋”、“比”、“兴”、“雅”、“颂”）联系起来，才产生了《文心雕龙·诠赋》所谓“六义附庸，蔚为大国”的说法。这两种说法究竟谁是谁非，笔者在《汉魏六朝辞赋》一书中已有论述，在这里不想重复。但最早的赋作者大约就是屈原、宋玉和荀况，这大约是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最先提出此说的是《汉书·艺文志》：“春秋之后，周道寢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据《汉书·艺文志》的“诗赋